

大家小书

新人生论

冯友兰 著 王碧滢 编



大
家
写
给
大
家
看
的
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新人生论

冯友兰 著 王碧滢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人生论 / 冯友兰著 ; 王碧滢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9.3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4482-6

I. ①新… II. ①冯… ②王…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2161 号

总 策 划 :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 高立志 邓雪梅

· 大家小书 ·

新人生论

XIN RENSHENG LUN

冯友兰 著 王碧滢 编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1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0-14482-6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总 序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①

郑 敏

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为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这就是“二战”时期闻名世界的中国最高学府——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那位长者正走向路边的一间教室；我和我的一位同窗远远跟在我们的老师——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后面，也朝着那间教室走去，在那里“人生哲学”将展开它层层境界。

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回答说：“到了天地

^① 本文原载于冯钟璞、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那位戴墨镜的教授是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金岳霖教授，先生因患目疾，常戴墨镜。这两位教授是世界哲学智慧天空中的两颗灿星，在国内外都深受哲学界同行的敬仰。

我在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原想攻读英国文学，在注册时忽然深感自己对哲学几无所知，恐怕攻读文学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当时联大哲学系天际是一片耀眼的星云，我心想，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天象，我何不先修哲学，再回过头来攻文学，以便对文学能有深刻的领悟？于是就在极为激动的心情下注册为哲学系的学生。回顾此生我想当时我作了对自己以后一生心灵成长十分正确的一次决定。但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我总是想在哲学里找到诗歌，而又想在诗歌中涉及哲学，一心二用，又怎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呢？记得除了“康德”一课，我的成绩总是平平偏下。大约在二三年级时我修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人生哲学。我虽然对冯先生的讲课印象极深，而且从自己的上述角度特别喜欢人生哲学的境界说，每次聆听冯先生的讲授都是一次精神的升腾，无穷享受，然而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我仍然不是一个优秀生，甚至有些意马心猿。当时西南联大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学术风气，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对于我来讲，

他们就像孔子或柏拉图一样，是智慧的化身，一言一行都向围绕着他们的青年学子散发着他们自己的深邃的思想和领悟。智慧并不只锁在课堂中，而是弥漫在整个新校舍的四周，包括大西门一带的茶馆里。每当空袭警报拉响时，老师和学生们就会默默地夹起书本，向新校舍后一片野地荒坟散去，但没有什么能打断他们对真理的沉思，即使在敌机从头上飞过，眼见炸弹落下，他们也仍在思考，思考中国的明天。那时的课堂已变成坟堆间的空地，飞机过去后继续看书、讨论。在生活与学术间几乎没有什么空隙。

由于自己的成绩平平，我在课外没有敢去和哲学大师讨论什么，但没有想到冯先生的“人生哲学”与“中国哲学史”课却像一种什么放射性物质，一旦进入我的心灵，却无时不在放出射线，影响着我的思维与感性结构。这两门课加上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郑昕先生的康德与冯至先生的歌德是我的知识建构中的梁柱与基石。冯先生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启发了我对此生存目的认识和追求。人来到地球上一行，就如同参加一场越野障碍赛，在途中能支持你越过一次次障碍的精神力量，不是来自奖金或荣誉，因为那并非生命的内核，只是代表一时一地的成败的符号、荣辱的暂时性，甚或相互转换性，这已由人类历史所证明。只有将自己与自然相混同、相参与，打破物

我之间的隔阂，与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生机，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过“得失”这个最关键的障碍，以轻松的心态跑到终点。宇宙与自然无限的、生生灭灭的，人的生命参与其中，此“得”可为彼“失”，此“失”又可为彼“得”^①，破除了人与自然、宇宙或古人所谓的“天”之间的隔阂，“回复与万物为一体之境界”（见《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65页注）那种最足以给人以虚假的鼓励或致命的沮丧的“得失”的大障碍，也许就能被较轻松地越过了。这种对“天地境界”的想法绝非玄远的空谈，它糅合了我们传统的儒、道两家对天、地、人关系的领悟和最大的智慧，在后工业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进入人与自然相依存的认识，而不是人要征服自然，以谋求无穷的物欲的满足，如果人之“得”成为自然之“失”，人类最终也要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地球，岂非是最大的“失”？当我们大踏步走向工业化的转型时期，我们先哲关于人与自然的智慧的预言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的这些关于“天地境界”的想法，初始于西南联大的教

① 这里关于“天地境界”得失关系的想法是我本人的理解，也许是一种误读。

室，日后伴我走过不少自己的难关。1949年到1955年，美国的麦卡锡反共政策使我的留学生活充满了物质的困窘与精神的压力。我是一个分文莫名的硕士研究生，1949年布朗大学的教务主任告诉我，我在校两年期限将满，必须作离校准备。因为1949年我一直在边打工边写论文，到9月份论文仍未完成，眼看将功亏一篑，我只好去全时打工，准备在离校后白天打工、夜里写论文。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中国大陆留学生是很敌对的，我除了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之外，还不断受老板的白眼和讥讽，常被当成一个潜在的敌人，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习目标。1952年夏我将自己的论文寄回布朗，获得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是一位专攻17、18世纪英国文学的学者威伯斯特教授，他常说我有一个奇怪的东方头脑，也许他指的就是我的那种对天地境界的信念吧。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特别是冯先生的关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教育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遇事、遇人、遇问题，它总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的决定和反应，并且决定了我的科研和写作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种古老的中华智慧使我似乎有一架天梯，可以爬上去自空中观看这场混乱，因而既置身于其中，又能在其外，在精神世界中保留着与天地境界的无声对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的博士生虽攻当代西方文论与诗

学，他们的必读书目中总有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这给他们贫乏的哲学基底以很大的充实。生活在地球村的今日，我们的青年学者必须带着自己的中华文化走进当代世界文化的展厅，对自己母文化有所知，才可能在平等的文化基点上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否则，就无资格在世界文化展厅占一席之地。尤其是攻读西方文化和诗学的外语专业学者，绝不应赤手空拳、胸无成竹、茫然地进入西方文化阵地。文化交流的是否能“给予”与“吸取”，全看参与者本身的文化素养。对自己母文化无知，自无法与他文化对话，其结果也难以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相遇中吸收他文化的精粹。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每个与西方文化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包括高层次的自然科学家都应该一读，或多或少地领悟一下中华文化的精髓，否则每当向西方世界介绍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时都会内心感到不安。《中国哲学史》的英文版本被列入每一期的美国的“学者书架”购书目录中，但在国内则很难购到该书的中文版。可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价值意识还没有跟上整个形势的发展。

近来在教学之余，部分地重温了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与《人生哲学》，深感先生是一位十分开放的学者，他对哲学的追索探寻，反映了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真理

方面的登山、历险精神。冯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时正逢英美实用哲学得势之时，因此对先生的重理性与科学分析的倾向有一定的影响。但冯先生却是一位吸收各家之长，能容纳多元思维的哲学家，他对于儒道两家同异的比较及对古今中外哲学学派的比较研究，显示出先生探索之深，萃集智慧之广，渴求真理之诚。重温冯先生《人生哲学》，始意识到先生的思考在当时即已触及当代哲学界所热衷讨论的多元思维及真理价值问题。我自1986年后在教学与科研中都接触到当代哲学、语言学、文学评论对一个中心论及二元对抗模式的思维方法的批判，其目的在于走出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专断、僵化对人的思维现代化的阻挡。因反思自己在20世纪前半叶接受新教育时也深深种下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轻视，盲目地将古典文化传统与新文化对立，似乎不扫除古典传统的影响，无从立“新文化”，这自然是20世纪以来流行于我国的“新思潮”，为当时的年轻人所普遍接受的思想。今天回想起来这种将传统与革新截然对立，将中华古典文化传统与西方思想对立，也都是狭窄的二元对抗思维，如不走出，则不利于自一个广阔的多元层次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不利于复兴和发展古老的充满智慧的我们自己的母文化。冯先生在论古代百家时指出各派哲学“多有‘见’于宇宙之一方面，遂引申之为一哲学系统，故有所‘见’，亦有

所‘蔽’”（见《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508页注）。认识到这点就不会以一派为中心，为正统，而歧视其余，唯有走出这种中心论，思维才能博采众长，使各派以己之“见”补他派之“蔽”，又以他派之“见”补己之“蔽”，将对抗转换成互补，进入多元的思维，也是当代思潮所追求的开放的心态。冯先生在比较儒道的异同时指出，道家之蔽在于将一切人之所为排除在自然之外，加以否定，所以其“无为”是一种“损”的哲学，儒家一方面吸收了道家关于“道”的理论，一方面不排斥人的所为，但应不为功利而为，此所谓“无所为”，是“益”的哲学。冯先生的理论消除了将儒、道放在对立位置的“出世/入世”，对抗思维，在伦理学上使二者互补，使封闭的名利追求，官禄等级结构受到“道”的洗涤，以出世的境界介入世事，达到修身养性而又积极介入的“益”的境界。人们的偏见与摇摆，与因此发生的种种内耗矛盾，多起自二元对抗的狭窄僵化思维。冯先生在上半世纪即已倡导扬各家之“见”，克各家之“蔽”的治学精神，今日读来，令我十分敬佩。

今天的青年，正生长在一个如沸鼎的时代，他们精力充沛，满怀对事物探索的热情，在此时如不给他们以接触自己古老的文化的机会，他们所能得到的将只是电视机发送出的商业

文化快餐，对西方世界物质繁华的一些浮光掠影的窥视。中华文化的宝贵泥土已慢慢流失近一个世纪，一个失去对自己昨天的记忆与认识的古老民族，往往以模仿西方文明为建立新文化的模式，年青一代如果不知“玉”在何方，他们对一拥而入的商业文化（并非西方真正文化传统）的泡沫将失去辨识真伪的能力，甚至成为商业文化耀眼包装的俘虏。所以在他们接触一拥而入鱼龙混杂的他文化的同时，一定要补好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刻认识的一课，这自然远非为了开发旅游财源而已。既不能如“文化大革命”时砸烂孔家店，也不能仅只读孔家饮食文化，而应深深地追问中国哲学史古典文化中究竟有些什么是我们应当带进世界文化博览厅，供世界人民参观，使之赞叹不已的。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冯友兰先生之举的最深刻的意义。

目 录

001	/	对于人生问题的一个讨论
012	/	大人物之分析
016	/	势力之分析
020	/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甲）
024	/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乙）
030	/	人生术
034	/	青年的修养问题
042	/	论信念
047	/	“贫穷的哲学”
052	/	论救国道德
056	/	论主客
062	/	论知行
067	/	再论知行

071	/	论悲观
076	/	乐观与戒惧
078	/	论命运
083	/	论信仰
088	/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甲）
091	/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乙）
097	/	论风流
110	/	关于真善美
116	/	一个新人生论（上）
146	/	一个新人生论（下）
164	/	人生成功之因素
173	/	新旧道德问题
180	/	我的读书经验

对于人生问题的一个讨论^①

——在中州大学讲演会讲演稿

今天，贵会开第一次会，使我得来恭逢这个盛会，我实在很喜欢。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对于人生问题的一个讨论》。我去年在曹州中学讲演时讲的，大约都是西洋哲学史，当时他们一定叫我讲我自己关于人生的意见，我讲了一点，以后又参（增）加了一点，就成了这个演讲。

民国十二年中国思想界有一个顶关紧的事项，就是人生

① 192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叫作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论战中，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一方，称为“科学派”。以张君勱、梁启超为一方，称为“玄学派”。论战的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1923年和1924年，冯友兰先生就这个问题分别在曹州中学和中州大学做了两次讲演，对两派的论战做出了回应。